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叶舒宪 主编

纳日碧力戈 著

语言人类学 (修订本)

人心感物，语言乃生；

人造文化，语言造人。

人类文明离不开跨系跨界的复调交流和文化沟通，

“话语权”离不开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资助出版（项目编号2018GY006）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叶舒宪 主编

语言人类学

（修订本）

纳日碧力戈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SK19N07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人类学 / 纳日碧力戈著. —修订本.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9.7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 叶舒宪主编)
ISBN 978 - 7 - 5695 - 0856 - 7

I. ①语… II. ①纳… III. ①人类语言学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2880 号

语言人类学(修订本)

YUYAN RENLEIXUE

纳日碧力戈 著

责任编辑 张旭升
责任校对 雷亚妮
装帧设计 锦 册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牵井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06 千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95 - 0856 - 7
定 价 6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35 传真:(029)85303879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资助出版（项目编号2018GY006）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编委会

主 编

叶舒宪

副主编

李永平

编 委

冯晓立 刘东风 徐新建

彭兆荣 程金城

总序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之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对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人文学界催生的这个新兴学科,给出一个较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以便继往开来,积极拓展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新局面,可谓恰逢其时。

50后这代人的青春岁月,激荡在汹涌澎湃的“文革”浪潮之中。“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相当于天赐给这一代知识人第二次青春。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在1978年春天步入大学校园,那种只争朝夕、如饥似渴的求学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也第一次带来人文科学方面的世界景观。正如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人文学者们也投入全副精力,虚心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神话-原型批评”就是当时的新方法论讨论热潮中,最早进入我们视野的一个理论流派。1986年我编成译文集《神话-原型批评》时,先将长序刊发在《陕西师大学报》上,文中介绍原型理论的宗师弗莱的观点时讲道:

物理学和天文学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化学形成于18世纪,生物学形成于19世纪,而社会科学则形成于20世纪。系统的文

学批评学只是到了今天才得以发展。……正像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把握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一部文学作品,它所体现的规律性因素不是作家个人天才创造发明的,而是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在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这种规律性的因素就是“原型”。……从文学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植根于原始文化,最初的文学模式必然要追溯到远古的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去。“这样说来,探求原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上的人类学”。

II

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样一段话,居然能够准确地预示这一批学人后来几十年学术探索的方向。“文学人类学”这个名称,也就由此在汉语学术界里发端。10年之后的1996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首任会长为萧兵先生),如今简称“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研究文学的神话原型,到探索华夏文明的思想、信仰和想象的原型,这一派学者如今正式提出的大小传统理论和文化文本符号编码理论,可以说早已全面超越了当年所借鉴学习的原型批评理论,走出文学本位的限制,走向融通文史哲、宗教、艺术、心理学的广阔领域。

从1986年到2018年,整整32年过去了,我们也经历了自己人生从而立到花甲的过程。如今我们要解读的是5000多年前的先于华夏文明国家的“文化文本”,阐发的是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大墓的神话学内涵。这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问题意识,先把我们引入文化人类学的宽广领域,再度引入中国考古学的全新知识世界,这样的跨越幅度,的确是当初摸索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时所始料未及的。

从原型批评倡导的文学有机整体论,拓展到文化符号的有机整体论、史前与文明贯通的文化文本论,这就是我们努力探索近40年的基本方向。西周青铜器上出现“中国”这个词语,至今不过3000年时间。2018年2月4日,我第二次给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开设讲座,题目是“九千年玉文化传承”。今日的学者能够在9000年延续不断的文化大背景中研究“中国”



和“中国文学”，就是从先于文字的文化大传统，重新审视文字书写小传统的一套完整思路。相信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理论思路和研究范式，是学者们对西方原型批评方法的全面超越和深化，这将会引向未来的知识更新格局。

本丛书要展示这40年的探索历程，以萧兵先生为首的这一批兴趣广泛的学人是如何一路走来，并逐渐成长壮大的。本丛书将给这个新兴学科留下它及时的也最有说服力的存照。希望后来者能够继往开来，特别注重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版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包括作为文史研究当代新方法论的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

是为丛书总序。

叶舒宪

2018年2月7日于北京太阳宫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语言人类学定位 002
- 第二节 形式、内容与意义 007
- 第三节 语言:能动和历时的多维活动 011
- 第四节 语言:指号系统 015

第二章 作为文化资源的语言:普遍性和相对性

- 第一节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021
- 第二节 结构与认知 032
- 第三节 语言的文化隐喻 071
- 第四节 时间和空间 077
- 第五节 社会分类 092

第三章 语言的由来

- 第一节 达尔文的进化论 096
- 第二节 从猿到人 098

第三节	人脑和语言	100
第四节	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	102

第四章 语言和实践

第一节	结构耦合	105
第二节	说话民族志	115
第三节	语言和行动	134
第四节	语言文化的翻译活动	138

第五章 文字的力量

第一节	关于文字的起源	146
第二节	文字和语言	150
第三节	文字的作用	152
第四节	超越文本	155
第五节	汉字文化的影响	158

第六章 重归语言人类学

第一节	游戏与规则	160
第二节	对话理论和社会行动理论	161
第三节	指号三性	168
第四节	移动符	174
第五节	认知语言学	177

第七章 语言和全球化

第一节	语言意识形态	181
第二节	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	187
第三节	数字化生存	197
第四节	“地天通”的新时代	200

参考资料	204
------------	-----

第一章 导论

语言人类学从文化、社会、历史、实践、权力五个维度研究语言现象,属于符号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语言是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语言是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语言承载历史记忆,语言表达话语权力。从人类学观点看,语言是复杂的指号系统(semiotic system),涉及元语言(用来解释和研究语言现象的语言),涉及文化隐喻和文化遗产,涉及社会记忆和社会行动,涉及权力关系、国家治理、民间应对。人类语言是人类存在的构成部分,文化、社会、历史、实践、权力五位一体,互为条件,互为环境,不可分割,不可倒置。文化现象的言说活动产生社会意义,话语实践贮存历史记忆,语言意识形态反映权力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意义来自差异,差异让交流成为必要,交流产生新的差异,新的差异让交流继续下去。从声音的抑扬顿挫到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从日常词汇的与时俱进到不同人群的方言土语,差异为信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没有变化,没有差异,就没有信息。语言行为反映文化边界,记载历史记忆;话语表达权力关系,折射不同的社会地位。

第一节 语言人类学定位

一、作为交叉学科的语言人类学

语言人类学是交叉学科,处于语言学 and 人类学之间,既可属于语言学,也可属于人类学。称之为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或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取决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个人偏好,不存在绝对标准。笔者根据语言人类学家海姆斯(Dell Hymes)的意见^①,把它归入人类学,称语言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语言现象和语言实践。

杜然提(Duranti)认为,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交叉重叠,难分彼此,要把二者区分开来,就要改写历史。^② 人类学家从语言研究社会^③,用音位学理论研究社会和文化^④,语言学家也用文化诠释语言^⑤。许多研究者并不在乎学科名称,用法比较随意。海姆斯在讨论语言人类学的时候,同时使用了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⑥ 尽管如此,半个多世纪之后,语言人类学还是确认了自己的名称和学科位置。^⑦ 语言人类学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他们要研究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等多学科问题。边缘即特点。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兼顾民族志浓描和理论对话,推陈出新,注重吸收当代

① Dell Hymes, "Objective and Concepts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n David, Mandelbaum, G. W. Lasker and E. M. Albert, eds, *The Teaching of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63, pp. 275-302.

② Alessandro Duranti,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

③ 如摩尔根、博厄斯。

④ 如列维-斯特劳斯。

⑤ 如柏林和凯研究颜色词。

⑥ Dell Hymes,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 Reader in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p. xxi-xxxii. ;Alessandro Duranti,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

⑦ 且不提国外大量的语言人类学专著和教科书,截至2018年6月,国内已经出版了三部冠名“语言人类学”的专著,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纳日碧力戈:《语言人类学》,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赵杰、田晓黎:《语言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思想精华,积极参与跨学科交流。语言人类学研究真实的社会人,把他们当作主体实践者,当作历史记忆的建构者和承载者,当作生活世界的分类者。语言人类学研究的主体是日常生活中的“各色人等”,历尽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人情冷暖。语言人类学者和其他人类学者一样,要参与他们的平凡生活,研究他们的日常交往,挖掘深层的社会意义。对于语言人类学者来说,参与和研究社会能动者的言行交融、社会建构的持续过程十分重要,只有参与观察才能发现和把握本土社会发展变化的脉络。

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也有密切联系。弗理(William A. Foley)指出,人类语言学属于语言学的分支,主要从人类学观点看语言,研究语言使用、语言风格、语言形式和语域(register),从中发现社会意义;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看作社会习惯,围绕年龄、性别、阶级、种族等等变量来观察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语言行为模式。其实,无论在社会思想渊源方面,还是在具体方法论方面,人类学与社会学都有很多交叉。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福柯(Michel Foucault)、布尔迪厄(又译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渗透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像年龄、性别、阶级、种族等概念,这两个学科也都在使用。拉伯夫(William Labov)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对语言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弗理和杜然提都在自己的著述中大量引述过他的观点。可以说,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之间界限不清。尤其是少数民族迁移和都市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反思、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等等,都是它们共同的研究主题。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看作文化资源,认为语言和语言的使用可以反映群体和个人的分类方式和思维特征,反映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也反映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着重指出,语言本身是社会构成的组成部分,我们出生在语言世界中,我们的社会养成首先是语言上的养成,语言深深嵌入人类的能动作用之中。博厄斯(Frank Boas)、萨丕尔(Edward Sapir)、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以及其他现代人类学大师,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语言对于社会的解释和表现作用,他们或者用语言隐喻社会和文化,或者直接从语言入手研究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者格尔茨(Clif-

ford Greertz)把文化看作文本和意义之网:

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以下的论说文试图表明它的效用。我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①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来研究,这本身具有独特、深远的意义。语言绝不限于教科书、大辞典里的正字正音或者规范文本,而是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活态交流过程。唯有扩大语言研究的范围,唯有把语言置于生活之流当中,我们才能进行跨学科的语言研究,才能够从现代哲学观点和社会思想中广泛汲取营养,充实自己的研究,提高自己的水平。

海姆斯在1964年编辑出版了《文化和社会中的语言——语言学人类学读本》,收入莫斯(Marcel Mauss)、梅耶(Antoine Meillet)、列维-斯特劳斯、布朗(Roger Brown)、布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等人的著述,这些作者不一定认为自己是语言人类学者,但这个读本的面世具有重要意义:它确定了语言对于理解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性,确定了文化和社会相对于语言的关联性。^②

语言人类学对许多人类学主题进行了创新研究,如通过象征来表现的政治权威构成、权力合法化、种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的文化根据、社会化过程、人(自我)的文化构建、情感的政治性、仪式表演与社会控制形式的关系、范畴知识与认知、艺术表演与审美政治、文化接触与社会变迁等等,都在语言人类学中得到新的研究。^③

①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郭于华、李彬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 Alessandro Duranti, e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 Reader*, Massachusetts & Oxford: Blackwell, 2009.

③ Alessandro Duranti,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二、实践理论和无主体性

以“惯习”(habitus, 又称“社会习性”)为中心的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对语言人类学有特殊价值:语言是社会习惯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社会实践;语言习惯是无意识的习惯,它融入文化生活,嵌入生产活动,是表现在主体身上的“无主体性”。福柯在有关权力话语和生物力的论述中,也突出“无主体”观点。^① 社会人虽然有自己的意愿,但并不能真正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无形的力量控制着历史结局和社会后果,让社会充满不确定性。这样的力量是“合力”,它不独属于任何某个因素。这涉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讨论的社会能动者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在他看来,社会能动者和社会结构处于互动互生的过程,社会成员在这个过程中利用社会资源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他们在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又再生产了这些社会组织资源(结构)。吉登斯指出,社会结构的本质在于:它既是话语实践的工具(媒介),也是它的结果(产品)。这就是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②

三、指号三性、象征与认知

美国哲学家和指号学家皮尔士(C. Peirce)及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 Jakobson)都把包括语言在内的指号(sign)分为物感物觉、物物相指、心智意义三个部分,目前语言人类学常用象似(icon)、标指(index)、象征(symbol)三分,超越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两分法(能指 signifier, 所指 signified)。^③ 皮尔士指号“三性”(Thirdness)的创见,雅各布森关于语言诗学的创见,都是语言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根据。

人类学领域一直存在对心理和认知的研究意识和取向,只是各家在处理心理、认知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看法不同,有时大相径庭。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要彻底理解人类社会,就要把它作为符号系统来研究。^④

① Hubert Dreyfus and Paul Rabir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③ 皮尔士的指号三性很复杂,本书第六章第三节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④ J. H. Beattie, *Contemporary Trends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Sociologus, 1955.

克拉克洪(Clyde Klukhohn)在研究那伐鹤人的时候,先是关注社会制度,随后转向它的象征体系。^① 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和认知人类学深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而雅各布森的音位理论更是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和各种文化形式可以反映他们的心理结构,可以通过转换生成,由具体文化的二元对立推导出抽象形式。由于文化材料的结构是无意识的产物,本土人对这种结构的看法并不重要,因此由具体的文化材料推演出的无意识结构是普世成立的通则。早期的认知人类学与语言学、生物学有不解之缘,它既用语言学的成分分析法研究亲属称谓,也用生物学的分类方法研究具体社区中的分类体系。后来,认知人类学引进心理学的范畴理论,研究范畴和记忆及推理的关系,进而又涉足人工智能的研究。如果说象征人类学代表了“由外向里”的观点,那么,认知人类学代表了“由里向外”观点。前者不大注意个体和生理特性,后者常常忽视社会性。

四、意义和行动

如果说语言研究曾经忽视意义研究的话,那么,现在经过马林诺夫斯基、雅各布森、拉可夫(G. Lakoff)、西尔弗斯坦(M. Silverstein)等人的努力,至少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语言研究和意义研究已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指示词语(Deixis)理论^②、语言行动理论^③及命题理论^④,为语言人类学开

① Roy D' Andrade,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13.

② Roman Jakobson, *Shifter,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Charles Fillmore, *Santa Cruz Lectures on Deixi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1971; Michael Silverstein, "Shifters, Linguistic Categories and Cultural Description," in Keith Basso and Henry Selby, eds., *Meaning in Anthropolog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6, pp. 11-55.

③ John Ross, "On Declarative Sentences," in Jacobs, Roderick and Peter Rosen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Waltham, Mass: Georget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nguage, 1970; Jerrold Sadock, *Toward a Linguistic Theory of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John Searle,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④ Robin Lakoff, "If's, and's, and but's about conjunction," in Charles Fillmore and Terence Langendoen, eds., *Studies in Linguistic Semantics*, New York: Holt, L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pp. 114-149.

拓了无限空间,使它充满活力,主动和其他学科对话,取长补短,发展自己。莫里斯的句法、语义、语用三分法,对于语言人类学具有特殊意义^①,受到人类学领域意义研究者^②和语用研究者^③的欢迎。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句法、语义和语用之间的传统藩篱在生成语义学和言语行动理论中不复存在:语义是语法结构的基础,对指号的运用产生了指号系统和指号意义,或者说,指号系统和指号意义来自对指号的运用,是后者的功能。^④

第二节 形式、内容与意义

语言人类学研究涉及文化、社会、历史、实践权力五个维度。不过,换一个角度,它也涉及形式、内容和意义三个方面。弄清语言的形式、内容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梳理相关研究的脉络,有助于提高理论对话的层次,也有助于提高学科的整体水准。

社会人文学科的形式、内容与意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哲学问题。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断言水是万物之本,水可以呈现为固体、液体和气体;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出于“一个永恒不朽的实体”;阿纳克西米尼认为万物之源可以是空气,可以是蒸汽或者水汽。^⑤如果说,米利都学派是西方“内容派”的创始者,那么可以说,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形式派”的创始者。他们认为数字是万物之源,“数必定是真正的实在、事物的基础,一切事物都是数的表现”。例如从奇数和偶数的对立可以导

① Charles Morris, *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46.

② Ward Goodenough, “Componential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f Meaning,” in *Language*, 1956, 32(1): 195-216; J. F. Lounsbury,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Pawnee Kinship Usage,” in *Language*, 1956, 32(1): 158-194.

③ Dell Hymes,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in Gladwin, Thomas and William Sturtevant, eds., *Anthropology and Human Behavior*, Washington, DC: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1962, pp. 13-53.

④ S. Bean. *Symbolic and Pragmatic Semantics: A kannada System of Addr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Introduction, pp. xii-xiii.

⑤ 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英汉对照)》,贾辰阳、解本远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17—20页。

出有限与无限,一与多,左与右,雌与雄,静止与运动,直与弯,光明与黑暗,好与坏,正方形与长方形;又如从数与形的关系可以得知点是一,线是二,面是三,体是四,土是六面体,火是四面体,空气是八面体,水是二十面体。^①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二元对立与后来索绪尔的二元对立存在异曲同工之妙,强调形式,重视关系,不研究具体的质料、孤立的质料,而是集中研究这些质料的相互关系,以及由这类关系生成的形式。

西方哲学主流以二元对立为基础,讨论和研究精神与物质、经验论与唯理论、形式与内容之类的对立关系。经验主义认为经验是知识和观念的唯一来源,尤其强调感觉经验,否认或者贬低先天观念、先天范畴和先天知识。唯理论坚决反对经验论一切知识都来自感觉经验的原则,认为必然、普遍、可靠的知识不能来自经验,只能来自先天的自明之理。康德试图调和二者的关系,强调互动、辩证和能动,对后来的社会人文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近代的传统哲学思想一直在寻找社会秩序的自然基础,寻找永恒的人性,寻找超越人类的进化图式。然而,在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哲学唯心论重新抬头,似乎社会不再受永恒法则的支配,而要听命于社会能动者的主观意愿。不可否认,人类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整体观和相对论,它的民族志方法,都对其他社会现象产生了重要影响。^②

涂尔干致力于实证研究,强调用参与观察的方法研究社会分工和自杀等社会现象,研究社会团结和社会矛盾的条件,他的终极目标是发现稳定的结构,探索人类的普遍价值和道德观。从笛卡尔、霍布斯到穆尔、康德,他们都追求新古典社会模型,探索自然法则,研究社会规律,定位终极目标。这些思想家一致认为社会生活原本是和谐一致的,矛盾背后有结构,有规律。不过,康德本人把各种哲学问题归结为符号形式问题,也意识到理性的非理智基础。^③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了符号形式理论,讨论符号形式与思维的关系。许多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包括涂尔干、韦伯、莫斯、冯特、索绪尔、维特根斯坦和皮尔士,都围绕康德提出的问题著书

① 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英汉对照)》,贾辰阳、解本远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22—23页。

② Janet Dolgin, et al, *Symbolic Anthrop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7.

③ Janet Dolgin, et al, *Symbolic Anthrop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1.